



日本研究丛书

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 演进谱系

(1972~2012)

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Politician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田庆立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日本研究丛书

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 演进谱系

(1972~2012)

The Evolution of Japanese
Politician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田庆立◎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 1972~2012/田庆立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5

(日本研究丛书)

ISBN 978-7-5097-7059-7

I. ①日… II. ①田… III. ①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1972~2012
IV. ①D8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4256 号



· 日本研究丛书
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 (1972~2012)

著 者 / 田庆立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晓卿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李秀梅 于占杰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63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059-7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项目编号：TJZZ12-022）

天津社会科学院2011年度院级重点课题（项目编号：11YZD-07）

天津社会科学院2014年度学术著作出版补贴项目



绪 论	1
第一章 中日复交初期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 (1972 ~ 1978 年)	20
第一节 日本政界人士围绕中日复交的政治博弈	20
第二节 围绕反霸条款的战略之争	61
第三节 福田内阁的缔约认识及行动	75
小 结	98
第二章 “友好”基调下的“建设性接触” (1979 ~ 1992 年)	100
第一节 影响日本对华合作的认知因素	100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中国观及其实践	115
第三节 中曾根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及其中国观	125
第四节 日本政界人士的国际观与中国观	136
第五节 日本政界人士的历史观与中国观	156
小 结	169
第三章 积极对华认知与“战略性防范”意识的交错 (1993 ~ 2000 年)	172
第一节 影响日本对华认知的内外因素	172
第二节 积极对华合作认知理念及实践	183
第三节 “战略性防范”意识的形成及表征	196
小 结	226
第四章 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中国认识 (2001 ~ 2012 年)	229
第一节 21 世纪以来影响日本对华认知的内外因素	229

2 | 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①演进谱系（1972~2012）

第二节 21 世纪以来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	241
第三节 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中国观	261
第四节 小泉时代及后小泉时代政界人士的中国观	272
第五节 民主党执政时期政界人士的中国观	291
小 结	307
结 论	309
参考文献	327
后 记	337

绪 论

一 选题缘起

中国和日本具有 2000 多年的友好交往历史,经常被形容为“一衣带水”。但是,近代以来,由于历史积怨和基于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博弈,两国关系经常处于错综复杂的状态之中。从 1972 年中日复交至 2012 年,两国关系从冷战对峙状态逐步走向缓和,其间既曾留下“蜜月时代”的美好回忆,也出现了诸多摩擦和矛盾。自 2012 年日本对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以来,中日关系又呈现一种紧张状态。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双方崇尚“友好”,密切加强合作;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从以往单纯倡导友好的“理想主义”,逐步向更为注重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转变。冷战后日本的外交与战略思想也从“自由和平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外交理念的形成为外交政策的制定无疑与决策者的认知及观念息息相关,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参与决策的并不是抽象的“国家”,而是具体的“决策人”。政治心理学奠基人斯布罗特夫妇认为,“一个人的价值观与其他心理倾向共同指导着他有选择性地看待周围的环境,他根据有意识的记忆和潜意识的经验去解释他所选择的周围环境”^①。一切外在因素,包括国际格局、国家利益等,只有通过决策者才能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无疑深受国际格局的转换、中国和日本国内政治生

^① 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The Ecological Perception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18.

态的变化以及中日两国国家实力消长等因素的影响。

有关中国人的日本观和日本人的中国观的专题性研究，在中日关系研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中日复交后，日本人的中国观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其对日本对华决策有何影响，日本人的中国观，尤其是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等，这些课题亟须做进一步深入探讨和考察。以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作为研究对象，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从学术角度而言，系统考察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变迁，有助于深化日本对华决策机制的研究。如果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做一比较，我们可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具体而言，冷战后期，在日本政治家的国际战略视野中，中国在中美日联手对抗苏联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基于意识形态因素的考量，中国又是日本为确保亚太地区稳定，诱导其融入主体体制所应竭力争取的对象；从双方继承的历史遗产来看，中国放弃巨额的战争赔偿，日本作为加害者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债，因此对中国提供援助和加强合作对其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冷战结束后，这一系列促动中日关系友好的因素逐渐淡出历史视野。随着苏联解体及东欧剧变，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以往中美日联手对抗苏联的架构消失；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蓬勃发展，日本则经历了“失去的十年”的痛苦磨砺，两国“此消彼长”的态势逐渐引起日本人的嫉妒和疑忌，中国也随之取代苏联成为日美同盟的主要假想敌之一，中日两国在友好时代所隐含的一系列矛盾和摩擦随着交往的不断加深，逐步凸显出来。对于日本而言，中国从原来的“友好伙伴”渐次演化为值得警惕和关注的“竞争对手”。显而易见，20 世纪 90 年代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发生了巨大转变，其时间断限大体上以冷战终结为分野，如果不对冷战结束前后两个阶段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做出历时性的勾勒和描述，我们就无法理解日本对华政策缘何在 90 年代发生诸多变化，也就无法有效解释日本的对华政策为何与以往相比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矛盾性。

“如果不考察决策者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和对其他人的认识，就无法解释重大决定和政策是怎样形成的。”^① 在中日复交后的不同时期，日本政界人

① [美] 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 18 页。

士对中国的态度和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对华政策的走向。因此，对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领导人和群体的中国观进行学理性的探讨和挖掘，不仅可以厘清不同时期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缘何发生转变，还可以加深对同一时期处于不同立场的人士在涉及中国问题上所持立场的认识。系统分析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变迁，有助于深入了解日本政府对华决策背后的观念动因，加深对日本制定对华政策过程中政治文化和认知因素对外交政策影响的理解。从政策层面上讲，日本国内政治的特点决定了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是对华政策制定中的关键变量，必然会影响到限制日本的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在不同时期和阶段，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角色的定位会对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起到促动或制约作用，而理想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应该建立在相对客观而准确的中国观基础之上，这是确保双边关系稳步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二，从文化层面而言，对于中国这一地理距离“近”、心理距离“远”的国度和人民，日本人的观念和意识中究竟存在着什么看法？有什么概念？有什么印象？如果他们必须对此做出回答的话，那么他们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得出了一些什么结论？在这些年的快速变化和诸多冲突中，已经产生了哪些新印象或改变了哪些印象？具体地将这些问题搞清楚、弄明白绝不是件轻松的工作，但是对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增强制定对日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却又是无法绕开的重要课题。“对国外中国观的研究，从深层的意义上来看，还是文化。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她的传播、演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其中有什么机制和规律？东西文化怎样互相碰撞、吸引？怎样互相评说、估量？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地位如何？作用如何？怎样与世界各类文化相互作用，并在这种交互作用下建构自身？这些文化研究中的重大课题，都可以在国外中国观的考查和研究中获得一种新的视角。”^①如何运用历史学、政治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此展开专题性研究，对其进行文化意义上的阐释和解读，无疑具有较强的文化层面的学理意义。

第三，从思维认知角度而言，进行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研究，有助于

^①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学林出版社，1991，第15页。

解析日本对华政策在冷战前后体现出的“延续性”和“权变性”特征，进而有效把握其对华政策制定中“变”与“不变”的因素。影响日本对华政策的变量主要与国际环境、中国的实力变化、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日本政治家的政治理念以及中日两国在身份认定上的建构与互动等密切相关，通过对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深入解析，可以发现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知和决策与中国的国势消长具有互动重构的特点，这为研判和预测未来日本制定对华政策的走向和趋势提供了较为客观的决策依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曾作如此分析：“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① 恩格斯的这段话论述了某个国家的群众和领袖人物的思想动机对于把握这一国家的发展趋势和历史规律的重要性。具体而言，对于人们头脑中反应和形成的对象客体如何认知？如何转化为行动？其间受何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可见，对人的思想认知和思想动机进行深入研究显得至关重要。

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包括政治家的个人生阅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外在条件等，因此其中国观既有对中国现实情况的如实反映，也受主客观条件的约束和制约，存在着“误读”和“误判”。多年前，芝加哥大学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汉斯·J. 摩根索在一次演讲中讲道：“好的外交政策通常是好的常识，好的常识通常能制定好的外交政策。”^② 决策者对认知客体的审视和观察往往与客体本身的实际情形存有距离和差距，正如博丁指出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通过对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研究，力图求证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与决策者的观念因素之间的密切关联性，旨在阐释其与认知客体——“中国”存在何种差距，目的是“主要考察日本人心目里的

① [德]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2，第40页。

② [美] 吉姆·赫尔姆斯、詹姆斯·普里斯特主编《外交与威慑：美国对华战略》，张林宏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191页。

‘中国形象’与实际的中国的错位，想通过分析这种错位，使日本与中国之间构筑起正确的关系”^①。

正如黄遵宪、戴季陶在中国的知音寥寥，胜海舟、竹内实在日本也属于少数派一样，两国之间彼此错看和误读的痼疾已有上千年历史，想要“治愈”原非易事。所以，在两国各自的对外关系中，尽管长年倡导“睦邻友好”，中日关系或日中关系却向来都可谓最复杂、最棘手、最微妙。二战结束后，两国各自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又因政治道路的歧异和两极格局的存在，给清楚认知对方带来了新的困难。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蜜月时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跌入“低谷”，与之相伴的是两国国民彼此观感的负面印象所占比重逐渐上升。这种情况的出现并长期持续，除因冷战结束而导致的国际秩序的变迁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双方缺乏正确而客观的认知。一旦交往骤然频密、距离迅速拉近，种种不如所愿的不满、失望、误解旋即应运而生，最终由云里雾里的“相亲”一步步走向了眼睁睁的“相厌”。^② 如何摆脱双方认知上的“困境”，既需“知己”，更要“知彼”。对中日复交以来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演进谱系进行系统梳理，目的无非是厘清“彼方”对“己方”的认知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影响决策的，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寻求消除无端猜疑和“误读”、加深双方理解和信任的有效途径。

第四，从现实层面而言，深入分析中国崛起在影响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有助于为中国制定行之有效的对日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进行的核试验、中国崛起及台湾问题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给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探询藏在其后的深层动因，采取相应对策，促进中日关系向前发展，这是由日本既为经济大国，又系中国近邻，中日关系是中国周边外交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等现实因素决定的。

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是世界面临的最富历史意义和极具挑战性的重大课题之一。“政治家是国家权力运作和政策决定过程中的主体之一，其个人

① [日] 竹内实：《作者前言》，载竹内实《日中关系研究——竹内实文集·第五卷》，程麻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第3页。

② 沃尔夫-冯：《中日千年错看史》，<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13118.shtml>。

的文化构成和历史认知必然会渗透在其政策决定过程中的思想、理念、政治倾向、价值判断以及利益选择上。国家利益的认知和判断是由政治家个人作出的，任何国家的政策行为实际上都难免带有决策者个人政治文化和思想倾向的印记，并通过政策的实施影响国家的发展方向。”^①就日本而言，日本政界人士确立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对华认知，对于能否制定合理有效的对华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譬如，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崛起，以及该对此做出何种反应？是把中国看作一个潜在或现实的威胁，还是视为可以合作的伙伴？对中国的不同定位事关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就中国而言，我们不但要掌握和了解日本政界人士如何对中国进行定位，更应该影响和改变中国在日本政界人士心目中的消极认知与负面印象。“中国威胁论”大多是建立在一部分日本政治家视中国为敌人或对手的错误认知与战略误判基础之上的。如何化解“中国威胁论”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减少这些不利因素对中国和平崛起的阻碍，亟须认真研究“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各界萌生蔓延的生成机理，从而制定中国的因应之策。事实上，研究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在对华决策中所起的制约或促进作用，能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日本对华决策背后的心理机制、文化基础及价值观念等。

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方面的意义，本书主要依据日本政府公布的官方文件及档案材料、官员发言、国会答辩记录，日本政治家和官僚的回忆录和著述，中外学界的有关论著，大众传媒的报道和评介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借鉴国际政治中的建构主义和政治心理学理论，系统考察和分析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及其在对华决策中的作用；通过整合既有的学术和研究资源，在宏观考察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变迁的同时，对具有代表性政治家的中国观进行微观解读，并对一部分对中日关系具有影响力的群体进行中观考察，着力挖掘不同类型政治家的中国观在对华决策上呈现的不同特点，深入剖析思想认知与行动抉择之间互动关系形成的内在机理，以期阐释日本对华决策背后的政治文化及观念因素与对华决策之间的“力学”关系，旨在描摹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在40年间变迁的总体图景，力图对深化中日关系的研究有所助益。

^① 刘建飞主编《政治文化与21世纪中美日关系》，解放军出版社，2006，第87页。

二 研究现状

针对中日复交后日本人的中国观,尤其是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等课题,日本学界鲜有颇具针对性的专题研究,但在诸如日中政治外交史、日中关系史及日本外交等相关论著中,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有关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内容。中国学界则侧重围绕日本对华决策机制及中日关系等课题展开研究,对日本政界人士的思想认知如何影响对华决策方面的研究尚显薄弱,有待于进行深入研究和考察。

(一) 日本学界研究现状

日本学界专门研究中日复交后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学术论著较少见到,但一些综合性学术著作及政界要人回忆录和著述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时期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朝日新闻》社论主笔若宫启文的《和解与民族主义》^①是一部与本书研究对象较为接近的论著。该书是作者在1995年出版的《战后保守势力的亚洲观》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原书在详尽地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精辟地阐述了战后日本保守政党领导人对亚洲的认识及其处理日本与亚洲关系的经过。新著比原来增加了近十几年来的最新资料,而且从政治思潮变迁、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对日本政坛主流派的亚洲政策做了全新阐释。该书勾画了战后日本政治家秉持的保守本流中国观的演变轨迹,揭示了日本保守政治家在面对亚洲邻国问题上遭遇的两难之境:既想通过清算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历史寻求与亚洲邻国的和解,又想利用狭隘民族主义的力量凝聚民心 and 实现大国夙愿,这种矛盾心理鲜明地体现在小泉内阁上台后的对华政策上。该书提出的战后保守本流的中国观和“翌年法则”^②等规律,对于研究和理解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具有重要借鉴作用,但由于该书的视角涉及亚洲全域,对日本政界人士中国观的论述仅占一部分,因此对于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这一重要课题而言,尚有深化和拓展的余地。

① 若宫启文『和解とナショナリズム——新版・戦後保守のアジア観』、朝日新聞社、2006。该书中译本系由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书名为《和解与民族主义》。

② 若宫认为,日本政治中存在着可以称为“翌年法则”的规律。头一年日本可能在战争问题上做一些反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关系会有些进展,而第二年往往就会做出让中国等亚洲近邻非常反感的事情。“翌年法则”反映了日本总是在自傲与自耻之间来回游移的一种心态。

马场公彦的《现代日本人的中国像》^① 依托日本综合杂志刊载的相关论文素材，勾画了自中日复交直到天皇访华 20 年间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变迁图景。永野信利的《天皇与邓小平的握手》^② 是作者作为一线外交记者长年跟踪采访中日关系以及日本政界动向后汇总形成的学术成果。该书揭示了日本和中国之间在有关中日复交、围绕反霸条款和第三国条款等问题上交涉的内幕，集中反映了当时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及相关的决策过程。尽管该书的立论角度侧重于日中外交史，但仍有诸多值得借鉴之点。NHK 采访组撰写的《周恩来的决断》^③ 一书通过对中日复交期间亲历者的采访，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复交内幕，对理解日本政界人士的对华认识提供了大量颇有价值的素材。横山宏章的《日中的障碍》^④ 阐述了日中友好外交的内涵、付出的代价及中曾根内阁时期日中纠纷处理机制的运作等，分析了维系日中友好关系的内在机理和存在的问题，阐明了中日之间对对方的不同认识给两国关系发展带来的影响等。

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⑤ 阐述了小泽构建“普通国家”的构想，反映了日本在冷战后对国际秩序重建及日本所应发挥的国际作用的认知；在有关对华关系方面，小泽主张应该从“特殊”关系发展为“普通”关系，体现了新生代政治家基于国家利益和现实主义考量的中国观。本泽二郎的《日本政界的“台湾帮”》^⑥ 对战后台湾当局如何在日本政界、财界物色和扶植“亲台派”，试图左右日本的对华政策方面有着较为深刻的揭露，对当前台湾在日本的院外游说活动以及日本政界主要亲台团体“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的现状进行了详尽分析。

李恩民的《“中日友好和平条约”谈判的政治过程》^⑦ 运用大量外务省最新解密档案资料，采访了缔结中日友好和平条约时的亲历者，围绕“反霸权条款”、“第三国条款”及友好和平条约交涉内幕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尽管该书系政治外交史类著作，但其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对于认识

① 馬場公彦『現代日本人の中国像』、新曜社、2014。

② 永野信利『天皇と鄧小平の握手——実録・日中交渉秘史』、行政問題研究所、1983。

③ NHK 取材班『周恩來の決断』、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3。

④ 横山宏章『日中の障壁——戦争と友好の代償』、サイマル出版会、1994。

⑤ 〔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冯正虎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⑥ 〔日〕本泽二郎：《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吴寄南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⑦ 李恩民『「日中平和友好条約」交渉の政治過程』、御茶の水書房、2005。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政界人士的中国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若月秀和的《“全方位外交”的时代》^①一书将 1971~1980 年的日本外交概括为“全方位外交”，该书依循“全方位外交”的萌芽、停滞、发展及终结的历史脉络进行论述，从国际政治的宏观视角，侧重分析了中日两国在围绕反霸权条款争论中的苏联因素和美国因素的影响，为深入了解当时日本政界人士的国际秩序观和中国观拓展了思路。

日本政治家和外交官的回忆录和著述^②，也为本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素材，尽管一些个人回忆录不无粉饰之嫌，但若细加甄别，仍然具有较大参考价值。“亲台派”代表性人物贺屋兴宣在其《战前战后 80 年》的回忆录中，列举了不应“抛弃台湾”的主要理由，对深入了解自民党内“亲台派”势力的中国观大有裨益。田中角荣的秘书早坂茂三撰写的《早坂茂三的田中角荣回忆录》分析了促使田中做出访华决断的内外因素，阐述了田中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与中国的关系等。中曾根康弘的《天地有情》回顾了中曾根执政时期加强与发展中日关系的战略意图，以及化解中日双方纠纷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理解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政界人士的主流对华认知具有参考价值。

综观日本学界有关日本人中国观的研究现状，学者大多围绕某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外交谈判过程立题，对政治外交方面的研究居多，具体论述思想认知与对华决策之间关系的著作并不多见，但日本学者的相关论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外交官的回忆录还是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

（二）中国学界研究现状

中国学者撰写了大量有关中日关系及日本对华政策方面的论著^③，对中

① 若月秀和『「全方位外交」の時代——冷戦変容期の日本とアジア・1971~80年』、日本経済評論社、2006。

② 賀屋興宣『戦前戦後80年』、経済往来社、1976。岡崎嘉平太『私の記録——飛雪、春の到るを迎う』、東方書店、1979。大平正芳の回想録刊行会『大平正芳の回想録』、鹿島出版会、1982。早坂茂三『早坂茂三の田中角栄回想録』、小学館、1987。古井喜実：『日中关系十八年——古井喜实回忆录』，田家农等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福田赳夫『回顧九十年』、岩波書店、1995。中曾根康弘『天地有情』、文藝春秋、1997。宮沢喜一『新・護憲宣言』、朝日新聞社、1995。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山崎拓『2010年日本実現』、ダイヤモンド社、1999。

③ 刘江永：《彷徨中的日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张健主编《当代日本》，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刘江永：《中日关系二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金熙德：《21世纪初的日本政治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金熙德：《21世纪的中日关系》，重庆出版社，2007。

日复交后日本人的中国认识有所涉及，具有代表性的为：吴学文等著《当代中日关系》（时事出版社，1995年）、宋成有等著《战后日本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吴寄南主编《站在新世纪入口的日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金熙德的《中日关系：复交30周年的思考》（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徐之先的《中日关系三十年》（时事出版社，2002年）、冯瑞云等的《中日关系史》（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等。这些专著大多从中日关系的宏观角度分时段进行论述，部分涉及日本政界人士制定对华政策过程中思想认识的变化等。与前述关于日本学界的研究状况类似，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仅在对华决策的行为过程中附带提及或有某种程度上的间接反映。

近年来，中国学界关于中日关系和日本对华政策方面涌现了一批专论性的研究著述^①，主要围绕某一主题展开论述，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具有代表性的有：刘江永主编的《跨世纪的日本》（时事出版社，1995年）辟专节梳理了自二战后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历届内阁对华政策的思想源流及演变过程，认为日本对华政策变中有不变，不变中又有变，并与其民族性有一定关联。王新堂的博士学位论文《从血仇到友邻》^②系统考察了中日复交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因、过程及其产生的影响，为深入了解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认识的演变提供了有益参考。吴寄南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时事出版社，2002年）认为，新生代政治家的崛起是冷战后日本政局演变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作者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政治家群体崛起的背景及过程，逐一介绍了分布在朝野两大阵营的政治新秀，科学地概括了新生代政治家的共同特征，并对新生代政治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敏锐地指出随着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活跃于政治舞台，将会给中日关系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安保问题上带来消极影响。

① 张香山：《中日关系管窥与见证》，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蒋立峰主编《当代日本社会思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徐静波、胡令远编《战后日本的主要社会思潮与中日关系》，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童新政：《日本高层看中国》，台海出版社，2003。王希亮：《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黄大慧：《日本对华政策与国内政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孙成岗：《冷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8。

② 王新堂：《从血仇到友邻——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考察》，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1997。

李建民的《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论述了日本“普通国家化”给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分析了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国内外背景,试图从“友好”模式转变为“普通”模式,以增强对中国的自主性和对等化;文中运用一定篇幅对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对本书很有借鉴作用。

刘江永的《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 2007年)集中围绕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日关系出现的“政冷经热”现象进行探讨,分析了中日经贸关系、日本政治右倾化、日美同盟、领土问题及历史问题与中日政治关系之间的互动及影响,对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进行了论述和阐释。黄大慧的《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年)对天皇访华的决策过程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日本政界人士在天皇访华问题上的争论及“宫泽决断”的背景等。吴光辉的《日本的中国形象》(人民出版社, 2010年)则侧重从文学层面概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到战后,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嬗变过程。

杨栋梁主编的《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1~6卷)(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年)依据大量的原始文献和档案资料,基于日本、中国和世界的共时性三维视角,历时性地考察了自近代以来直至21世纪初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变,分析了不同时期日本人中国观的内容和特点,探讨了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规律及本质特征。这套丛书的出版对推动和深化中国学界有关中日关系中的认知因素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本书提供了“航标性”的理论指南,极富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可见,中国学界的先行研究成果更多地关注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的新动向与中日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集中反映了冷战后日本对华政策转变的原因和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对本书的研究颇具启发性。

综观中日学界关于中日复交后日本人中国观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立足于从某一侧面分析立论的较多,缺乏对日本政界人士整体对华形象认知与对华决策之间关系的系统分析;从中日关系、日本政府对华决策、中国崛起或“中国威胁论”等领域进行专题研究的成果较多,但侧重于研究日本人的中国观的成果则很鲜见。这表明目前学术界对思想认识究竟对中日外交决策机制有何影响方面的研究尚嫌薄弱,尤其需要就日本政界人士对中国的认识如何影响对华决策开展专题性研究。